

收稿日期:2024-10-17

地支字源分析:史前狩猎采集的视觉叙事

周秋明^{1,2}

(1.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社会科学部,江苏 南京 210023;

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6)

摘要:对十二地支的字源分析,可阐释其序列蕴含的新石器中期黄河中游狩猎采集社会的经济生产技术和宗教祭祀文化的视觉叙事编码:“子丑寅卯”记录狩猎兽物情境;“辰巳午未”分叙采集野穗行事;“申酉戌亥”呈现因物质收获而荐献于茅藉的尝祭。基于技术与文化语境的贯通以完整考释十二地支的“狩猎”“采集”“尝祭”本旨,不仅属于汉字字源的学术覃研,也将深化对我国史前狩猎采集叙事逻辑的理论探讨,进而助力新时代中国叙事体系的构建。

关键词:地支;字源;狩猎采集;尝祭;视觉叙事

中图分类号:H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6)03-0046-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数字媒介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视觉转向研究”(23BKS122)。

作者简介:周秋明(1979—),男,江苏镇江人,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历史阐释学与人文语言学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6.03.006

揭橥古代社会叙事逻辑是新时代构建中国叙事体系的内嵌子题和前置区块,但目前学界对我国史前狩猎采集叙事的系统考察,主要基于侧重科技的考古学和侧重宏观人文的人类学^①,至于观照微观人文从而直接展示叙事逻辑主体性的字源学视角,纵在史料佐证相对丰富的汉字字源学畛域,有关研究依然深受构形多源、文献不足、史迹离析等客观因素制约。职是之故,关于史前狩猎采集社会叙事语境的汉字字源考证,如今基本上通过古文字由殷商前后生业经济泛向还原^②,犹未对农业和畜牧业占据统治地位之前独立的狩猎采集叙事作专项分析,尚处于散点厘释和枚举归纳的渐再探索阶段。

① 相关研究参见:查于珊登《狩猎采集社会研究述评》,《学术研究》2010年第5期;范可《狩猎采集社会及其当下意义》,《民族研究》2018年第4期;张雨男《从“重写”到“本体论”——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狩猎采集社会研究》,《世界民族》2020年第4期。

② 这些考证相对集中于渔猎活动。诸如杨升南、马季凡《商代经济与科技》(宋镇豪主编《商代史》卷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五章“补充肉食来源的渔猎活动”,蔡欣恬《从〈说文解字〉中探析古代农牧渔猎》(许钺辉主编《中国语言文字研究辑刊》四编第一册,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二章“《说文》与中国古代渔猎”,杨杨博士学位论文《商代田猎刻辞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年),等。

经过对相关问题的多载审辨,笔者发现早期中国狩猎采集社会形态与地支字这个在庞杂牵曳的古汉语文字丛林中并不多见的自组织体具有极为紧密的联系。本文尝试全景推阐十二地支序列(主要依托最早的成熟汉字系统即晚商甲骨文,兼及商周金文)初始语义蕴含的狩猎采集技术与文化的视觉叙事编码,企冀这份思考能够对我国史前狩猎采集叙事逻辑及相涉汉字字源研究略致裨益。在此理当申明,要洞洽此类自组织体的内生义旨,就不能囿于单字或臆乎歧指,而需形成完整通妥的合理诠释。这种较高的任务相依性,固然加深诂释汇析的难度、增剧望文生训的风险,但终究能让考订者获取语义互契互校方面的积极毗助。

一、“子丑寅卯”:史前狩猎叙事的视觉编码

(一) 地支“子”

地支“子”甲骨文𠄎(《甲骨文合集》^①35406号)^{[1]175},象形字:颊生毛发,屈膝跪地。而《说文·子部》:“𠄎,古文‘子’,从𠄎,象发也。𠄎,籀文‘子’,凶有发。”^{[2]309}比照可知:地支“子”喻幼兽,甫降生时因孱弱而跪伏,正视之如甲骨文字形;《说文》“子”喻幼孩,既分手足,稍长而直立。按《尚书·尧典》谓春季“鸟兽孳尾”^{[3]34},《玉篇·子部》:“孳,孳产也。”^{[4]528}“孳”“子”古音亦同(精母、之部)。然则地支“子”为“孳”本字,后世混淆𠄎(兽“子”)、𠄎(人“子”)俱书“子”,乃增声旁“兹”为“孳”表示𠄎原初意义。

按《礼记·曲礼下》:“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麇卵。”孔颖达疏:“麇乃是鹿子之称,而凡兽子亦得通名也。”^{[5]138}又《礼记·月令》告诫“孟春之月”“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麇毋卵”^{[5]545}、“季春之月”“田猎置罟、罗网、毕翳,餗兽之药,毋出九门”^{[5]567}、“孟夏之月”亦“毋大田猎”^{[5]578},唯秋季始大规模行猎。这些关于周代礼制的记载倡导的是季节性捕猎,以避免杀鸡取卵。然而回瞰农耕普及之前的狩猎年代,实际上那时并无限定出猎季节,如黄河中游冀南豫北的新石器早期磁山文化所示^②,不过猎民为保证肉食摄入量与生存需求的历时性动态适配,往往选择成年野物实施捕杀,实例参见王华等先生对黄河中游新石器中期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梅花鹿遗存的研究^③。

循持物质实践制约观念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地支“子(孳)”绝非表示猎杀幼兽,而是寓意天地间兽物的蕃育,然其深层境域究竟在狩猎经济抑或畜牧经济,尚赖参校后续地支字而不可孤悬设定。

(二) 地支“丑”

“丑”甲骨文作𠄎(《合集》16301号)^{[1]314},象手末端佩指套,喻运力挖取,即耙抄原型。按《说文·手部》:“搯,搯也。”^{[2]251}《广雅·释诂二》王念孙疏证:“《众经音义》卷七引《通俗文》云:‘搯出曰掏。’”“搯、掏,一字也。”^{[6]192}又“丑”“搯”古音相同(皆透母、幽部),是以“丑”宜为“搯/掏”


① 以下正文里《甲骨文合集》皆简称《合集》。

② 据研究,该文化遗址猎获的动物“既有随季节移迁的”,“也有常年栖息当地的”,“说明狩猎活动是一种全年进行的、广谱狩猎的性质”的活动,“证明当时人们尚需从许多方面获得食物来维持生活的”。参见周本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的动物骨骼》,《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第342页。

③ 此项研究“表明多数的梅花鹿都是在成年体重达到最大后的两三年内成为人类的狩猎对象”。参见王华、王炜林、胡松梅《仰韶时代人类狩猎梅花鹿的策略:以铜川瓦窑沟遗址为案例》,《人类学学报》2014年第1期,第95页。



本字。^①

(三) 地支“寅”


“寅”商金文作 (《殷周金文集成》^②5394号)^{[7]2173},会意字:双手握杆,杆端尖刃,喻使用矛槊。分化字“戣”,《说文·戈部》训“长枪也,从戈寅声,《春秋传》有‘搗戣’”^{[2]266}。又引申“戣”,《玉篇·支部》训“搗也”^{[4]333}。

按《礼记·月令》言“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郑玄注:“五戎,谓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5]627}在这种属于军事演习并且或多或少具有表演性质的周代“田猎”中操持长“矛”的场景,应当发端于包含“寅”在内的远古矛槊作为狩猎工具的经济运用,不过是社会生产能力的跃迁在某些执“寅”者身上消减了人类最早的谋食动机,他们开始日益注重借此展现自己的威武骁勇。

由最初的猎杀装备“寅”反观地支“子(孳)”(兽类繁衍),其义断然与古代畜牧业无甚关联,而是寄示作为狩猎经济之生态前提的野兽孳殖:赖此保障连续稳定的狩猎活动,亦凸现该项生业对于早期民众生存质量的重要意义。同样,地支序列“丑”(掏挖)前置于“寅”(持矛)明显意味着先掏掘营造坎窞,俟猎物陷入窞中再投枪矛毙之。

随着人口的增多和协作的熟练,狩猎者越来越倾向主动出击即驱兽落窞,而不是一味消极等待:若“逐”甲骨文 (《合集》10234号)^{[1]306}即会意驱赶走兽;又“兽”甲骨文 (《合集》31924号)^{[1]1195},会意携“单”(分叉杆)、“犬”以行猎,印证范可先生所语:“狩猎采集生计的基础是猎取野生动物、采集野生可食性植物,以及捕鱼。除了狗之外,他们没有任何驯化的作物或者动物。”^{[8]65}后人另造“狩”字表此义^③,因该方法并无显著杀伤性,结果和“逐”相同但效率有所提高,实际上是“逐”兽入窞的技术升级版。由于此间同源演进关系,“逐”(定母、觉部)、“兽”(书母、幽部)古音俱接近“丑”(“逐”与“丑”旁纽、对转,“兽”与“丑”准旁纽、叠韵)。

(四) 地支“卯”

“卯”甲骨文作 (《合集》21291号)^{[1]1321},指事字:居中分切物体。按《玉篇·刀部》:“中分为剖。”^{[4]318}“卯”(明母、幽部)与“剖”(滂母、之部)古音相近(旁纽、旁转),当为同源字。殷商卜辞有祭名“卯”^[9],喻牲体既“卯”(剖切)而进呈,据此引申义知“卯”字当以剖剖兽腹为初义。

后世失察“卯”本义,乃视为声旁,增“卩”表意而为“劓”(《玉篇·刀部》“劓,割也”^{[4]320-321})。或转附形旁“金”作“劓(刘)”(来母、幽部),喻所用利刃,若《尚书·顾命》有“执劓”,孔颖达疏引郑玄云:“劓盖今钁斧。”^{[3]599-600}待《尔雅·释诂上》释“劓,杀也”^{[10]25},则“劓”“劓”二字已混用。

综览地支“子(孳)、丑、寅、卯”四字初旨,隐寓史前狩猎真实劳作情境的视觉叙事编码:起首“子(孳)”(野兽蕃殖)是先民行猎具备可持续性的自然基础;由此以“丑”(掏挖坎窞)形成捕兽设施;随后凭“寅”(手持枪矛)作为击杀方式;狩事告毕乃“卯”(剖剖猎物)以清理内脏、储备肉食。


^① 宋代戴侗《六书故》卷一五:“手丑,取物也。或曰手械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354页)训“丑”“取物”犹可,释“手械”者当是“柎”,按唐代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三八注“柎柎”引张戡《考声切韵》:“此皆拘执系固之具也。以木在项曰柎,在手曰柎也。”(释慧琳、释希麟《正续一切经音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516页)

^② 以下正文里《殷周金文集成》皆简称《集成》。

^③ 郑玄笺《诗经·小雅·车攻》“搏兽于敖”:“兽,田猎搏兽也。”(《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62页)“兽”用本义。张衡《东京赋》引作“薄狩于敖”(萧统《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第63页),兹可悉《车攻》“搏兽”之“搏”原文乃发语辞“薄”。


二、“辰巳午未”:史前采集叙事的视觉编码



(一) 地支“辰”

“辰”甲骨文作 (《合集》21145号)^{[1]855},象形字:以绳缚石片或蚌壳,乃古昔生民割刈谷穗、果实所用系绳石(蚌)刀(镰)。按《说文·虫部》:“蚌,蜃属。”^{[2]282}《太平御览》卷八〇二《珍宝部一》引《墨子》“楚之明月出蚌蜃”^[11],知蚌、蜃同类。郭沫若《释支干》谓“辰与蜃在古当系一字。蜃字从虫例当后起。盖制器在造字之前,辰既以蜃为之,故蜃亦即以辰为字”^{[12]394},诚为确论。


石兴邦先生曾指出:“带锯牙的石镰和蚌镰,有的人认为是农业的证明,实则反是,这是采集经济的产物。”^{[13]18}地支“辰”径从石(蚌)刀(镰)刈取开始,而不语耒耜耕耘之劳役,亦表明所获之物来自野生植物,因此历史方位应定格于农耕时代之前、与狩猎经济长期融合的采集时代,此间经济活动为采集而非以稼穡为特征的种植业(严格意义上的农业)。倘再进行区间分划,黄克映先生对比新石器早期磁山、裴李岗等遗址和新石器中期仰韶文化半坡遗址的收割工具石刀(镰)所执发的前者数量较少而后者有大幅增长的差别^①,可使我们得出前一阶段尚不足以构成地支“辰”的现实社会基础的判断。罗二虎等先生关于系绳石刀从新石器中期“仰韶时期开始出现并流行”而在新石器晚期“龙山时期仍然流行,同时还出现了少量蚌制同类收获具”^{[14]31}的结论,也提供了“辰”字表征的时代背景不应先于新石器中期的证据。

不宁唯是,从地支“辰”的相关孳乳字更可管窥我国早期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由采集业向农业的渐进演变历程。

首先,古人未事耕种之际,并非总是被动等待谷物和时果成熟,相反在实践中逐渐懂得主动割除芜草以助收成,这就是“蓐”。按“蓐”甲骨文 (《合集》20624号)^{[1]858},会意手执“辰”割“艸”(“草”)。“辰”取利(谷穗、果实)，“蓐”祛害(杂草),义理相对。又“蓐”省作“辱”,后世泛语劳苦,如《左传·襄公三十年》“使吾子辱在泥涂久矣”^{[15]1281},用作意动即《说文·辰部》所训“辱,耻也”^{[2]311}。此俗义去“蓐”既远,古人另造“耨”字存“蓐”初义,《淮南子·汜论训》有“摩蜃而耨”,高诱注:“蜃,大蛤,摩,令利,用之耨。耨,除苗秽也。”^[16]

其次,商周嬗替,田耕愈益昌繁,相比原始采集经济,稳居绝对优势,反映在西周金文上即为新造字:增附“田”于“蓐”,专谓农夫稼穡。常省笔,仅保留其核心部件“田”“辰”而为 (《集成》890号)^{[7]301};或讹“艸”作“白”而为 (《集成》10176号)^{[7]302},乃《说文·辰部》所载“農”^{[2]60}(这里“凶”亦“田”之异文)。凡此俱为古文“农”字。


(二) 地支“巳”

“巳”甲骨文作 (《合集》19952号)^{[1]170},象取木为杖,前端装设宽板。地支序列“巳”在割刈工具“辰”后,可知其专事拍击所割谷穗以使之脱粒(此处显然不用于果实)。



按此物旧名甚多,《方言》卷五:“金,宋魏之间谓之橛,或谓之度。自关而西谓之楛,或谓之拂。齐楚江淮之间谓之秧,或谓之梲。”郭璞注:“金,今连枷,所以打谷者。”^[17]《广雅·释器》:“魁、楛、梲、梲、秧、橛、梲、度,杖也。”^{[6]1020}皆其称谓。最常见者“楛”,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四〇“楛印”注:楛“今俗通作棒也”^[18]。《说文·木部》:“楛,柎也”,“柎,木杖也”^{[2]123},杖名“度”(定母、铎部)当为“柎”(透母、月部)通假字(旁纽、通转)。又云:“楛,楛也”^{[2]123},“拂,击禾连枷

① 遗憾的是,黄克映先生误将此类石刀(镰)认作收割农业产品的工具。参见黄克映《裴李岗、磁山文化长条形石铲辨——试论其文化的农业阶段及经济状况》,《华夏考古》1992年第4期,第46页。

也”^{[2]122}，“桡”(帮母、月部)和“拂”(帮母、物部)音义颇近(双声、旁转),杖名“梓”(并母、物部)当亦与“拂”同源(旁纽、叠韵)。



以上诸称谓里,“𣪠”声旁“是”,“是”(禅母、支部)和“巳”(邪母、之部)音相近(准双声、旁转);形旁“丈(杖)”,《玉篇·丈部》:“𣪠,横首杖也。”^{[4]526}所谓“横首”诚与“巳”初文相合。然则地支“巳”或为“𣪠”本字。又“𣪠”甲骨文 (《合集》21868号)^{[1]360},会意手持“巳”杖而击,“𣪠”音(禅母、侯部)与“巳”相近(准双声、旁转)亦证同源,料以此故而打谷木杖“巳”有别名“𣪠”。

(三) 地支“午”



“午”甲骨文作 (《合集》19773号)^{[1]1245}、 (《合集》20966号)^{[1]1244},象木杵、石杵形。“杵”字从“午”而后出。考虑到地支序列中,此前“辰”披露的采集经济背景以及“辰”“巳”分别作为谷物割穗、脱粒工具的性质,兹“午”(木石杵)表示的当然是谷粒去壳或碾粉的功能。根据赵志军先生的研究:“中国古代饮食习惯是粒食传统,不论是南方的稻米,还是北方的小米,都是整粒的煮食或者蒸食。”^[19]地支“午”反映的无疑主要指去除谷壳的工作。

诚然,目前可亲睹的加工粮谷的最早工具是石制磨盘、磨棒,它们在新石器早中期即已得到广泛使用:陈涛先生立足“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石磨盘、石磨棒比较兴盛,至晚期开始逐渐衰落”^[20]的走势,指明对其淀粉粒的分析结果,谷物“出现频率为85%”属最高^[20]。但正如陈文华先生所说:“《周易·系辞》:‘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此种杵臼难以保存,故不易发现,因此杵臼的历史并不一定比石磨盘晚。”^[21]

更为重要的是,杵臼和石磨盘在实际劳作中产生出不同的趋势,前者直到近代仍被普遍采用,而后者在新石器晚期即处于下坡路。个中缘由自然是面对经济发展,石磨盘开始陷入技术瓶颈,这一点亦可从实证考察作出判定:王海明先生用河姆渡文化晚期石磨盘做“碾米实验”,结论是“去壳可以,但除尽不易,效率不高”^[22];黄渭金、卢小明先生以河姆渡出土石磨盘重做这一实验,得到的补充经验是“每次碾磨数量少”而“散落较多”,同样“效率不高”^[23]。古人选择木石杵(“午”)作为剥除谷壳的代表性工具纳入地支序列,既由侧面佐证了这个结论和经验,也说明该地支序列(至少应包括采集叙事编码“辰巳午”)所表征的历史上限不可先于酝酿着石磨盘和杵臼此消彼长的新石器中期。

按“御”甲骨文 (《合集》20353号)^{[1]118}、 (《合集》6760号)^{[1]124},形旁“卩”、“彳”喻踞迎于道途,如《诗经·召南·鹊巢》“百两御之”(郑玄笺“御,迎也”) ^{[24]75};其“午”仅为声旁(“御”“午”皆疑母、鱼部)。罗振玉、郭沫若等以“卩、午”会意驾驭车马,乃误释“午”“象马策”或“殆驭马之辔”^{[12]396-397}。

(四) 地支“未”

“未”商金文作 (《集成》3904号)^{[7]2193},象籛帚之形。籛帚以籛竹为材料,此竹即古人所谓“竹箭”。《礼记·月令》载“仲冬之月”“则伐木,取竹箭”,郑玄注:“此其坚成之极时。”^{[5]650}取坚韧的竹箭编为籛帚,其尾端挺直如“未”初文;相较而言,“帚”商金文 (《集成》9873号)^{[7]1057},尾部倾侧,喻其质料轻柔,殆古人以“帚”命名秸秆所制管帚。

按《玉篇·竹部》:“籛,亡匪切,竹。”^{[4]278}《正字通·竹部》:“籛,无匪切,音尾。帚也。”^[25]“籛”义因“竹”而及“帚”,且“籛”(明母、微部)和“未”(明母、物部)古音甚近(双声、对转),然则可知“未”为“籛”本字。



地支以“未”置于“午”后,现实的劳作意义在于:虽则“杵”去谷壳(“午”),米和壳犹自混杂,若以竹帚迎风拂掠(“未”),可促使外壳飞散,米粒驻留。这应当属于较古老的“颍(扬)场”方法,

后世发明木杈、簸箕则是在此基础上相关技术的进一步发展^①。



要言之,本节所考释地支“辰、巳、午、未”四字内蕴,含括新石器中期以降史前生民采集谷米为食的视觉叙事编码:以“石(蚌)刀(镰)”直接割穗(“辰”)为起点,意味着历史坐标的划定(取材野生谷物,尚未农耕);其次以“木杖”扑穗而脱粒(“巳”);再次以“木石杵”剥去谷壳(“午”);最后持“竹帚”掠扫以净谷(“未”)。



三、“申酉戌亥”:狩采尝祭叙事的视觉编码

(一) 地支“申”

“申”甲骨文作 (《合集》20139号)^{[1]434},象闪电状,盖“电”本字。先民敬畏雷电,电光有形且先于雷声,乃以“申”(“电”)代指神灵;西周金文或增“示”喻祭礼作 (《集成》4022号)^{[7]23},“神”字遂通行(后世亦作“魃”,郭璞注《山海经·中次三经》“魃武罗”:“武罗,神名。魃即神字”^[26])。然“申”作为地支表示本义(闪电)抑或引申义(神祇),下文将结合其他地支字来判断。

(二) 地支“酉”



“酉”甲骨文作 (《合集》20278号)^{[1]1026}、 (《合集》33180号)^{[1]1029},象陶器,窄口、长身、狭底,形类似新石器中期仰韶文化的“小口尖底瓶”。刘莉等先生在分析研究米家崖仰韶晚期陶器、半坡和姜寨仰韶早期尖底瓶时指出:这种“遍布黄河中游地区,延续整个仰韶时期2000多年”的尖底瓶“器型特殊,其锥状的底部有利于酿酒过程中沉淀渣滓”,“其小口可方便密封”以创造“有利于发酵”的缺氧环境^[27];瓶身“一般为瘦高型体”,所形成的上下“自然对流”“有利于保证酒的质量”^[28]。陶器“酉”完全符合黄河中游新石器中期的酒器在形制上的要求和特征。

在“小口尖底瓶”之前的常见酿酒器是新石器早期的“小口鼓腹壶”,它和“酉”的字形并不相似,说明地支“酉”表征的年代不能前推到新石器早期。然而根据刘莉先生的研究,出土这类陶壶的河南贾湖遗址墓葬中“有骨笛和龟甲制作的响器,显然与宗教仪式有关”,揆度“贾湖人在进行这些仪式时,酒可能是不可或缺之物”^[27],指出了上古酒器和祭祀活动之间杳远而紧密的联系,及至新石器中期的仰韶中晚期许多大型遗址也“都发现具有礼仪功能的大型建筑。而尖底瓶是这些遗址的常见器物”^[27]。因此可确证地支“申”同“神”,取义祭神之礼,以行礼时置“小口尖底瓶”即酒器“酉”,故前后胪列于地支。另外“奠”甲骨文 (《合集》24号)^{[1]1031}、 (《合集》18554号)^{[1]1032},表示献“酉”于祭桌,古音(定母、真部)与“神”(船母、真部)甚近(准双声、叠韵),又与“申”同源字“电”(定母、真部)音同,也证实地支“申(神)”“酉”的内在关联。

用“小口尖底瓶”酿酒的新石器中期,主要“酿酒方法包括两种,一种是利用发芽谷物酿造的谷芽酒”,“另一种是利用发霉谷物及某些禾本科植物茎叶制麴而酿造的麴酒”^[29],足见地支“辰巳”(割穗脱粒)和“酉”(密闭发酵)意义的联结。又《诗经·周颂·载芟》:“载穫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秬。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24]1598}孔颖达疏“小序”云:“下民乐治田业,收获弘多,酿为酒醴,用以祭祀。”^{[24]1592}虽言西周农耕时代,其谷酿酒、祭神鬼沿袭的则是“辰巳—申酉”凝含的先民在采集时代的习俗。








^① 甘肃嘉峪关新城汉墓画像砖有六幅“持杈扬场图”,参见嘉峪关市文物清理小组《嘉峪关汉画像砖墓》,《文物》1972年第12期,第33、34、35、36、39页。

(三) 地支“戌”

“戌”甲骨文作 (《合集》19907号)^{[1]918}、 (《合集》6号)^{[1]916},象斧钺形,刃平直,以此贴就砧案切割肉食。按郑玄笺《诗经·小雅·楚茨》“或肆或将”云“有肆其骨体于俎者”,陆德明释文:“肆,解肆也。”^{[24]950}“戌”(心母、物部)与“肆”(心母、质部)古音相近(双声、旁转),知二字同源。

地支“酉”“戌”并举,其间囊括两层意义:近者言祭“申(神)”之物,“酉”喻酿酒献之,“戌”喻斫肉供之(郑玄注《周礼·春官·典瑞》“以肆先王”云“肆解牲体以祭,因以为名”^{[30]632},此祭牲即以庖刃“戌”制之)。远者言材尽其用,“酉”内酒取材谷米,由“辰巳午未”而得;“戌”下食取材畜肉,经“子丑寅卯”而有。

(四) 地支“亥”

“亥”甲骨文作 (《合集》19907号)^{[1]1220}:象聚拢草穗而倒持,上端喻刈去根茎,居中喻捆扎。按古人筹祭礼,《仪礼·士虞礼》载“苴刈茅,长五寸,束之”,郑玄注:“苴,犹藉也。”^{[31]921}《说文·艸部》:“藉,祭藉也。”^{[2]24}指放置祭品的草垫。制作祭垫的全过程与“亥”字形吻合:“茅”即“亥”主体部件;“刈”(《说文·刀部》“刈,切也”^{[2]91})是“亥”上端部件所示;“束之”作祭“苴(藉)”为“亥”居中部件寓意。

然则“亥”本义乃修治茅草为祭藉,后世《周易·大过》“藉用白茅,无咎”^[32]、《穀梁传·僖公四年》“菁茅之贡不至,故周室不祭”^[33],所谓者皆同。按“亥”(匣母、之部)和“茅”(明母、幽部)古音相近(声母关系密切^①,韵部旁转),当以二字同源之故。

据传世文献记叙,此种由茅草制成的祭藉(“亥”)具体用途有二:

一则借茅缩酒。《左传·僖公四年》“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杜预注:“束茅而灌之以酒为缩酒。”^{[15]378-379}《礼记·郊特牲》“缩酌用茅”,郑玄注:“沛之以茅,缩去滓也。”^{[5]955}若《周礼·天官·甸师》“祭祀,共萧茅”,郑玄注引郑大夫(郑兴)云:“萧字或为茜,茜读为缩。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渗下去,若神饮之,故谓之缩。缩,浚也。”^{[30]116}释之尤详。于此显现地支“酉”(酒器)与“亥”(祭藉)内涵之勾连。

一则以茅承牲。《仪礼·士虞礼》:“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肤祭,祭如初。”郑玄注:“苴,所以藉祭也。”^{[31]926}“肤祭”即牲祭,《广雅·释器》:“肤,肉也。”^{[6]963}牲祭用“苴(藉)”的情况又见《周礼·地官·乡师》:“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苴。”郑玄注:“郑大夫读苴为藉,谓祭前藉也。”自谓苴为苴,云“此所以承祭”^{[30]339-340}。据郑玄注《周礼·地官·大司徒》“奉牛牲,羞其肆”:“进所肆解骨体。”^{[30]319}则《乡师》所述盖先解牲体而后以茅藉承之,于此亦揭地支“戌”(解肆)与“亥”(祭藉)意义之相衔。

值得提及的是,马王堆帛书《式法》有牵涉祭祀的残句,范常喜先生将其中几处释读为“斧(脯)酉(酒)”,“尊(敷)之芙(蒲),白茅苴(藉)”^[34],这里恰是对茅藉的缩酒、承牲(脯)两项基本用途的集中叙述,也是“亥”与“酉”“戌”内在关联的显性展示。

至此地支“申酉戌亥”演绎新石器中期黄河中游祭祀文化的视觉叙事编码已然明晰:从敬祭神祇(“申/神”)展开,一方面酿成谷酒(“酉”),另一方面解肆牲肉(“戌”),俱以茅藉荐之(“亥”)。倘深入考究,“子丑寅卯”以狩野味,“辰巳午未”以采野实,此祭神之礼接续狩猎社会食材之收获,当属传世文献所载“尝”同类礼仪。《尔雅·释诂下》:“尝,祭也。”^{[10]38}《礼记·少仪》:“未尝不食

① 其间音理参见庞光华《上古音及相关问题综合研究:以复辅音声母为中心》(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三章“从音理上辨上古音无复辅音声母”第二节“论明母、晓母相谐的问题”。

新。”郑玄注：“尝，谓荐新物于寝庙。”^{[5]1203}得应时食物而先供奉神鬼即谓尝祭、尝新。

尝新有献酒之常习。《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尝酎”，杜预注：“酒之新熟，重者为酎。尝新饮酒为尝酎。”^{[15]1125}《史记·封禅书》亦云：“陈宝节来祠。其河加有尝醪。”^[35]凡“尝酎”“尝醪”皆与地支“申酉戌亥”之“酉”(酒器)相合。

又尝祭泛语荐食，然据《礼记·月令》所载：每荐五谷多有牲，诸如孟夏之月“以彘尝麦”^{[5]578}、仲夏之月“以雉尝黍”^{[5]589}、仲秋之月“以犬尝麻”^{[5]617}、季秋之月“以犬尝稻”^{[5]631}，俱“先荐寝庙”；亦有单荐牲者，如季冬之月“尝鱼，先荐寝庙”^{[5]654}。殆与地支“申酉戌亥”之“戌”(解肆肉食)照应。这里说明，尽管《月令》载列的礼俗主要出自农畜居首的周代，尚可遥察史前狩猎时代日常生活的影迹，此种历时性投影在文明史上则表现为孔子所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36]。

四、 结论及余论

总结以上考证所得可以大体悉知，晚商以来中华先民朝夕日用而遗却本旨的十二地支作为新石器中期黄河中游狩猎采集社会的实证信息的主体性编码，蕴含着经济生产技术和宗教祭祀文化的视觉叙事逻辑。

我国狩采社会史在这一时空范围内的物迹被选择并注塑为典型，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该社会形态当时正迎来其最为炫目的辉煌，尽管来自农畜生产的挑战已阒默无声地揭开序幕。白倩先生即以河南地区为例，阐明此地“新石器时代的生业方式总体上经历了从采集渔猎经济为主”“到以农作物栽培和家畜饲养为主”的发展，新石器时代中期“采集渔猎在经济生活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农作物种植和家畜饲养的水平较低”，而新石器时代晚期“大部分遗址的生业模式转变为以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为主的生业模式，采集渔猎地位较前一阶段下降”^[37]。

全部地支字自可追溯至使用者的远祖们在史前狩采实践中创造的刻划符号^①，然而两者断非简单的复刻关系。通过商代甲骨文、金文的地支字和现今发现的先前刻划符号的历史比较，能够甄察到形制布划的完善；经由地支的“三段式”结构(亦即本文分节阐释“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的理据)乃至每段首字(“子”“辰”“申”)的段内统摄作用、前两段技术应用与末段文化仪式的语境贯通，益可推究出序列生成的辑理。依此知晓，其中业已蓄积了不迟于虞夏时期的意识形态阶层出于视觉审美规范性而进行的整饬。

至于地支凡取十二字在商朝纪日(配合天干字)、在周秦纪月、在汉朝纪年(与天干相配)或纪时，乃后世历法制订者的拣选与借用。《史记·律书》《说文解字》等由此误把借入义域视作原初义域，将律历体系区判的物候、气象、天文反过来象定为地支字的最初奥旨，郭沫若先生的名篇《释支干》则是立足世界文明交流的宏旷视野继续推进该思路的代表作。在此意义上，本文所作尝试既是对中国叙事体系的前置历史区块所赋初值的勘审，同时可谓相关传统观念之认知讹淆的稽正还源。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应当谨严地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决不能由于文明史上晚出文献存世数量的优势，轻率地对地支字史前叙事语境的初始意蕴进行逆向增饰和裁截。

例如，按照周代的礼制，“尝祭”在秋季举行。《礼记·祭统》云“秋祭曰尝”^{[5]1588}，《礼记·王制》以“天子诸侯宗庙之祭”“秋曰尝”^{[5]451}。《礼记·月令》虽载夏、秋、冬皆有“尝祭”，实际上仍旧是依照周礼以“秋尝”为正统：关于荐五谷，《月令》唯孟秋之月(即“立秋”之月)尝谷而不用牲，所谓

① 对新石器时代以来刻划符号的整理检讨，参见：王蕴智《远古符号综类摹萃》，《中原文物》2003年第6期；王晖《中国文字起源时代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5]610},显示其与众不同的地位;关于荐牲,《月令》强调季秋之月“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5]625},同时“天子乃教于田猎”^{[5]627}，“执弓挟矢以猎。命主祠祭禽于四方”^{[5]630},规格至高^①。这个突出季节性的正统“尝祭”礼法的存在,是基于周人所建立的广泛而稳定的农耕文明,源自农作物秋熟的规律以及狩猎活动日益辅助化、象征化的趋势。但对于地支序列所映摹的史前时代来说,狩猎和采集无疑是最重要的生业经济活动,再加上极度落后的生产力状况,这些生产行为必然需要维持常态化,而不会拘囿在某个季节才密集开展;相应地,史前狩猎社会类似“尝祭”的有关宗教礼仪(如“申酉戌亥”的现实所指)自是四时常设,不能被狭隘地指定为“秋祭”。事实上,即使后世象征性礼俗也并不都是如此局滞,譬如军事属性显明的田猎就按照不同季节设有多种名目^②。

参考文献

- [1] 李宗焯. 甲骨文字编[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 [2] 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中华书局,1963.
- [3]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 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 李学勤,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4] 宋本玉篇[M]. 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3.
- [5]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 李学勤,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6] 王念孙. 广雅疏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7] 董莲池. 新金文编[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 [8] 范可. 狩猎采集社会及其当下意义[J]. 民族研究,2018(4):57-70.
- [9] 赵诚. 甲骨文简明词典:卜辞分类读本[M]. 北京:中华书局,2009:239.
- [10]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 十三经注疏·尔雅注疏[M]. 李学勤,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11] 李昉,等. 太平御览[M]. 夏剑钦,校点.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471.
- [12] 郭沫若. 释支干[M]//郭沫若. 沫若文集:第十四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 [13] 石兴邦. 前仰韶文化的发现及其意义[C]//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二).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1-23.
- [14] 罗二虎,李飞. 论古代系绳石刀的功能:兼谈民族考古学方法[C]//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考古学研究(十).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27-35.
- [15]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 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 李学勤,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16] 何宁. 淮南子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98:914.
- [17] 扬雄. 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M]. 郭璞,注. 北京:中华书局,1985:110.
- [18] 释慧琳. 正续一切经音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585.
- [19] 赵志军. 传说还是史实:有关“五谷”的考古发现[N]. 光明日报,2021-07-10(10).
- [20] 陈涛. 中国史前时期石磨盘、石磨棒功能研究:来自科技考古的证据[J]. 农业考古,2019(6):124-130.
- [21] 陈文华. 农业考古[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105.
- [22] 王海明. 宁绍平原史前农业初探[J]. 农业考古,1996(3):54-63.
- [23] 黄渭金,卢小明. 河姆渡“石磨盘”质疑[J]. 农业考古,2000(1):197-201.

① 另《左传·桓公五年》谓“始杀而尝”,杜预注:“建酉之月,阴气始杀,嘉谷始熟,故荐尝于宗庙。”孔颖达疏:“始杀尝祭实起于建申之月,今云建酉者,言其下限。”(《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左传正义》,第196页)按周历季秋“建申”,兹以孟冬“建酉”作下限,证《左传》亦视“尝”为秋祭。

② 若《左传·隐公五年》“春蒐、夏苗、秋猕、冬狩”(《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左传正义》,第106页),《公羊传·桓公四年》“春曰蒐。秋曰蒐。冬曰狩”(《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2页),《谷梁传·桓公四年》“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谷梁传注疏》,第47页)。

- [24]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 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 李学勤, 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25] 张自烈, 廖文英. 正字通[M].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6: 797.
- [26] 山海经[M]. 郭璞, 注. 毕沅, 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55.
- [27] 刘莉. 早期陶器、煮粥、酿酒与社会复杂化的发展[J]. 中原文物, 2017(2): 24-34.
- [28] 刘莉, 王佳静, 刘慧芳. 半坡和姜寨出土仰韶文化早期尖底瓶的酿酒功能[J]. 考古与文物, 2021(2): 110-122.
- [29] 刘莉, 王佳静, 邸楠. 从平底瓶到尖底瓶: 黄河中游新石器时期酿酒器的演化和酿酒方法的传承[J]. 中原文物, 2020(3): 94-106.
- [30]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 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M]. 李学勤, 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31]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 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M]. 李学勤, 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32]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 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M]. 李学勤, 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49.
- [33]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 十三经注疏·春秋穀梁传注疏[M]. 李学勤, 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34.
- [34] 范常喜. 马王堆帛书《式法》所记祝祷仪式疏释[J]. 文化遗产, 2011(1): 117-119.
- [35] 司马迁. 史记[M]. 裴骃, 集解. 司马贞, 索隐. 张守节, 正义.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1644.
- [36]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 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M]. 李学勤, 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25-26.
- [37] 白倩. 河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生业方式初探[J]. 南方文物, 2020(1): 167-178.

An Analysis on the Etymology of Earthly Branches: Visual Narrative of Prehistoric Hunting-Gathering

ZHOU Qiuming^{1,2}

(1.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dustry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Jiangsu, 211106, China)

Abstract: The etymological analysis of twelve earthly branches reveals the visual narrative codes in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sacrifice culture of the society featured with hunting and gathering in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in the middle Neolithic period. Tzu-chou-yin-mao (子丑寅卯) denote the prey; ch'en-ssu-wu-wei (辰巳午未), gathering of wild plants; shen-yu-hsü-hai (申酉戌亥), harvest sacrifice. Exploring the connotations of these earthly branch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ety and culture facilitates the etym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 research on the narrative logic of hunting and gathering in prehistoric China,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 system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earthly branches; etymology of characters; hunting-gathering; harvest sacrifice; visual narrative

[责任编辑:何敏敏]